



嗅着年味快回家

□徐成文

儿时好友崔大哥给我发来微信语音，邀约我一同回老家过年。他说，日子飘进腊月，他干瘪的肚皮，滴滴咕咕，想要老家的过年美食填充一下。

崔大哥年长我三岁，在那个补丁叠补丁的年代，我们两家走得近，犹如亲兄弟一般。我们一起逃学路上躲进山洞里打扑克、扇纸牌，一同在染丝坝河里摸鱼洗澡。长大后，崔大哥跟随打工大军去了广东一家建筑工地，从泥瓦匠干到现在的包工头，在广州最豪华的地段买了房，安家落户。

崔大哥的语音开始酸涩，我感觉到手机那端，他的眼眶一定在湿润。建筑行业，是个苦力的工作，风雨飘摇的几十年里，崔大哥流泪滴血的坎坷我可以想象。“兄弟，我太想念老家的那几道过年菜了。”崔大哥如数家珍，给我一报上菜名——老腊肉、麻辣香肠、雪白年糕、糯米汤圆……我其实也如崔大哥一般漂泊，虽距离老家几十公里，但父母已逝，老家房屋早毁，一年里回家的日子屈指可数，城里奢华的酒楼，可以装下荣华富贵，却始终盛不了儿时的年味。

崔大哥声音有些哽咽，我仿佛听见他的喉结在脆响。他说，在外地数十年，吃遍山珍海味，心里还是割舍不下老家的那一片片老腊肉。我取笑他：“你的胃没有与时俱进，在发达的广州，怎么也得把粤菜装得满满当当啊。”他沉默一会回答我：“可能我的胃如我一样，从哪里来要回哪里去，粤菜的甜味怎比得上老家的麻辣。”提及老家的老腊肉，我也垂涎三尺了。

我们打开肉肉的翅膀，回味儿时过年的味道。杀猪、腌制、熏烤，家家户户的灶台上，黑油油的腊肉悬挂着，

静候过年的日子步步靠近。待到过年那天，一块块晶莹剔透、腊香浓郁的老腊肉很快煮熟切片，醇香瞬间扑鼻而来，入口回味无穷。

我们以话当肉，美味如一张张画卷，在回忆里徐徐铺开。1989年的除夕，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时光，我们一边喝酒一边聊天一边吃老腊肉，时间被我俩在喝酒吃肉中打发殆尽。酒足肉饱，我们打着手电筒深一脚浅一脚地去八公里外的街上买回烟花。乡村的夜空，被烟花照亮，璀璨如白昼。父亲已端出香喷喷的花生瓜子，我们在磕磕绊绊中恭候新年的到来。母亲将腊猪头切成薄片，撒上白糖，让我们尝尝。虽然肚子里空间有限，但我们无法拒绝美食的诱惑，一筷子一筷子地夹起来，腊肉的烟熏味与甜味混合在一起，一种独特的风味在嘴里咀嚼，好一个美妙的守岁夜晚！

后来，我也时不时给崔大哥邮递过老腊肉，但他总是说缺点什么。我猜来想去，他一定是没有与儿时的同伴、也没有在夹杂泥土芬芳的老家环境下共享老腊肉吧。老家的老腊肉，离了老家，还是真正的腊肉吗？

曾是儿时玩伴，相逢就选过年时。我邀约崔大哥早点回来，我们一同去小婶家过年，去喝酒吃老腊肉。小婶是个生活精致的长辈，在她家过年，丰盛的餐桌上，一定还有红彤彤的麻辣香肠，石磨碾出的雪白汤圆，叔叔亲自包裹的春卷，还有刚从鱼池里打捞起来的草鱼。

快回家吧，一张高铁票，一张飞机票，出门在外崔大哥般的兄弟姐妹，年的味道越发浓烈，嗅着年味赶快回家吧。（作者系重庆散文学会会员）



能懂的诗

过年的味道

□黄愷新

除夕，在民间的地位连庙里的菩萨都无法撼动传统习俗的召唤，急切回家的心情并没有让滚动的车轮惊慌失措

年夜饭，丰盛的菜肴一团和气盘子装着的，碗里盛着的不仅有腊肉香肠烧白鸡鸭鱼肉还有父母的叮嘱，以及从他乡带回来的新鲜话题这么好的味道，得细嚼慢咽

小时候，仅仅为了一片肉一颗糖甚至一块烤红薯，我总是欺负弟妹常常气得母亲边流泪边斥责被父亲火爆的细竹条追打直到长大了才明白他们采取这样的教育方式为我的成长和起飞整理羽毛

离家的时候，难舍之情生怕触碰到父母最柔软的目光父母是我最敬佩的导师把吃过的苦全都忘掉从亲情里取出火柴点燃心中的烟花爆竹让他们放心不再为我出门在外担惊受怕

哦，过年的好味道只有回忆，才能保存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四九

□李举宪

眼睛里满含坚定它一定要把自己的事业进行到底气温一低再低冻土，冻河不得已，我把一条老狗让进屋来，烤火父亲把室外的水表用棉衣缠了又缠父亲戴上帽子免得头上雪上加霜搓着手，心里暗暗说你要下好大的雪就下要打多大的霜就随便我还节省钱买农药父亲还透过一场雪看半年我细细地观察

四九虽狂欢，眼角闪过一丝失落（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会员）

母亲做的布鞋

□刘艳华

人的一生中，总有一些东西能够穿越时空，触动我们的心弦。对我而言，那便是母亲做的布鞋。每每提及，心中便涌动着一股暖流，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充满母爱与温馨的年代。

母亲做布鞋的手艺，是家族传承下来的宝贵财富。她总能在繁忙的家务之余，抽出时间，一针一线地为我们姐弟三人缝制。那些布鞋，虽然简单朴素，却凝聚了母亲无尽的爱与关怀。

记得小时候，每次母亲准备做布鞋时，都会先是从柜子里拿出那些积攒已久的碎布头，洗净晒干后，用面粉打成糨糊，涂抹在面板或旧报纸上，然后，她将碎布平整地一层层粘贴，晒干后形成硬质的“布骨子”作为鞋底材料。这个过程需要极大的耐心与细心，母亲总是那么专注，仿佛在进行一场神圣的仪式。

接下来，母亲会根据我们脚的大小，在“布骨子”上画出鞋底样，小心剪下。通常一个鞋底需要六七层“布骨子”叠放对齐，用针线固定好，然后，母亲便开始纳鞋底。她用大号缝衣针和麻绳，一针一线地纳着，先用锥子扎眼，再引线穿过。这个过程非常费时费力，母亲常常熬夜赶制，只为了我们能够穿上暖和合脚的布鞋。

鞋底制完后，母亲便开始制作鞋帮。她选择耐磨的灯芯绒做鞋帮，裁剪出合适的形状，然后缝上松紧布，便于穿脱。鞋帮的颜色鲜艳，既美观又耐用。看着母亲那双灵巧的手在鞋帮上穿梭，我感到无比的幸福与满足。

最后，母亲将鞋帮和鞋底缝合在一起，一双结实舒适的布鞋就完成了。这是我们最期待的时刻，也是母亲笑得最为灿烂的时刻。现在回想起母亲在幽暗的灯光下，坐在炕沿上不声不响地纳着鞋底，还把针不时地在头发上抹一抹，又不声不响地吹灭灯，各自睡去，那温馨的场景让人不忍心长大。

每到季节更迭，脚下的布鞋也跟着变换，从春日的轻薄透气到冬日的厚实保暖，每一针每一线都蕴含着母亲深深的舐犊之情。那些年，穿着母亲亲手缝制的布鞋，走过青石板路，踏过乡间小道，每一步都走得那样幸福与安稳。

如今，虽然母亲已不再年轻，视力也不如从前，但她偶尔还会拿起针线，为儿孙们做上一双布鞋，那份坚持与爱意，让人动容。

母亲做的布鞋，它不仅仅是一双鞋，更是一份沉甸甸的爱，一份永恒的记忆。它提醒我，无论走到哪里，无论我成为什么样的人，母亲的爱始终是我坚实的后盾。

（作者系内蒙古通辽市作协会员）

父亲的故事

□胥涛

娘在哪里，家就在哪里。我小的时候，家在农村。

父亲，我们见面不多，一年里只有很短的一段时间，就是在他探亲的时候。对我而言，父亲显得既陌生又熟悉，陌生是因为相处时间少得可怜，熟悉是因为无法割舍的血缘。这种感觉很奇怪，有点像端着一碗夹生饭，吃起来不那么顺畅，也没有那种理所当然的喷香。

父亲是一位煤矿工人。1959年，他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离开位于重庆沙坪坝的一家工厂，远赴一百四十多公里之外，闭塞艰苦的南桐矿务局鱼田堡煤矿，从此便在万盛扎根了一辈子，像是把自己当成一根钉子钉在那里，再没有挪过窝。用他的话说，自己的工作在那里，自己的人生就会在那里，甚至自己的家都应该在那里。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们举家迁到矿上，曾经游离在家门外的父亲终于把家搬到了自己工作的地方。从此，我与父亲见面的时间多了起来，有了更多的时间近距离了解、熟悉和审视他。也可以说，我开始重新认识父亲。

父亲不太善于交流，甚至显得有些木讷，也可以说有些无趣。他是那种比较纯粹的人，说话直来直去，没有花花肠子，只晓得埋头干事。闲暇的时候，偶尔和我聊天，话也不多。只有讲到他们那一代人的奋斗故事，才莫名显得有些亢奋，还滔滔不绝——

“大跃进”过后，又逢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历史的原因，苏联把当时帮助中国搞建设的科技人员全部撤走，致使我国许多重工业陷于停顿。面对困难，中国人民没有屈服，喊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口号，大干快上，自己

搞油，自己出煤。

那阵子，矿工们就是凭着一股子建设国家的干劲，手提三尺风镐，创造着日产原煤上千吨的奇迹。当时没有炮采，更没有机采，都是风镐落煤，七八十米长的工作面，一天至少也要采完一排至两排煤，工作量极大。虽说是八小时工作制，可工人们常常一干就是十多个小时。当天工作没完成，大家都觉得脸上不光彩，开过“花脸会”后下井接着干。那时候矿工工资很低，但工人们上班不全是为了钱，只要每天能得到一份喜报、佩戴一朵大红花，就感到非常的荣耀。

当时，采、掘工作面全用的是木头支柱，还没有后来的金属、单体液压支柱和水泥代用品，所以坑木特别短缺。料源供应不上，咋办？就地取材。矿工们每天出井之后，都不忙着洗澡，啃上一个馒头，再到离井口几公里外的雅雀岩山上扛回一根木料，才算下班。

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矿工们只知道干好工作，忘却了什么是休息，星期天上班是常事。有些人走路都在打瞌睡，脑子里做着国家早日摆脱贫困、富强兴旺之梦，以自己能为国家多出煤、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尽一份力感到高兴和无上的光荣。

父亲的故事，就这样讲了一辈子，伴随我几十年，直到四年前那个寒冷的冬天，那个春节前的冬天。

岁月如梭，精神不朽。以此缅怀和致敬父亲及父亲那一代的共和国建设者！（作者单位：重庆市万盛经开区总工会）

